

內閣資政李光耀先生在
世界華商大會的開幕禮上發表主題演講
日期：1991年8月10日

中國與海外華人
“那不可或缺
的親切感”

我很高興歡迎各位到新加坡來，出席這個首次舉行的世界華商大會。這是一個讓華人企業家、商家和押出人士共聚一堂、互相交流的會議。噴射客機給旅行帶來了方便，使這個大會能夠成功舉行。

物以類聚，人類的天性也是這樣。對那些和自己相似，和自己具有相同的語言、文化和歷史背景的人，往往會感到興趣，喜歡和他們認同。目前，居住在中國、台灣和香港以外的華人，大約有2,500萬人：

(1)	東南亞	21,353,500
	美國	1,000,000
	加拿大	450,000
	拉丁美洲	302,900
	歐洲	408,000
	澳大利西亞	303,000

主辦這個大會的人士告訴我，各位來自30個不同國家的72個城市，包括中國、台灣和香港。各位都成功地克服了在不同國家里所面對的種種困難和不利條件。我深信，如果各位互相交換經驗，就能證實，各位的成功，主要的因素是節儉、刻苦耐勞、重視教育、社群的信任和互相扶持。簡單來說，就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使大家成功。

不過，隨着一代又一代的過去，對於你們當中那些不是在中國、台灣或香港居住的人來說，你們的原有文化正在改變中，因為你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環境，用的是外國語，如英語、西班牙語、泰語或馬來語。這無形中產生了一種文化同化作用，就是“文化與文化之間互相仿效的一種過程，也就是不同民族的人民

互相把各自的特質和成分不斷地傳給對方而產生各種新的混合模式。”（根據《韋伯斯特字典》的定義）。這就好像世界各地的華人餐館一樣。它們都很容易辨認出來，雖然因國而異，因為他們都為了適合當地的口味而改變風格。即使在中國內陸，中華文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共產黨人自1949年開始，就要徹底地改變中華文化。這導致一些不幸的結果，如鐵飯碗政策使工作道德淪喪。還好自1978年實行了門戶開放政策之後，情況有了進一步的改變。

台灣、香港和新加坡也都改變了，這主要是同西方接觸，通過生意上的旅行、到海外留學、外來旅客和無孔不入的傳播媒介而帶來的結果。新加坡的改變最為廣泛，因為我們是一個多元種族、多種語言的國家。英語是我們的工作語言，華語是我們的第二語言。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們有必要作出特別的努力，把核心文化價值觀，也就是儒家文化中富有活力的價值觀，傳給年輕一代。這些價值觀一旦喪失，我們的表現就會降低。

這是一個越來越互相依賴的世界。貿易、投資和旅行再也不受海洋、高山或國界的阻礙。新加坡人現在必須放眼國際。海外的華人企業家將是在這些國家裏很有用的聯絡人。民族、文化的親切感能促進聯繫和信任。

海外的華人和其他亞洲人，特別是印度人，可以協助新加坡人開拓海外市場。各位當中如有人有興趣把業務擴大到東南亞來，新加坡將十分歡迎。新加坡是本區域一個很方便的貿易和投資大本營，特別是聯營企業。像今天這類大會，對促進聯繫非常有用。

中國與海外華人

身為華人，我們自然會受到中國前途的影響。人們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觀點，一般上反映在海外華人身上。

自從1979年，中國實行門戶開放政策之後，人們可乘噴射客機旅行和利用資料傳真機，在北京和各省份的中國領導人對外界的動態便了如指掌。衛星電視和錄像帶、集體到中國旅行，包括每年超過2,500萬華人和將近200萬外國旅客，對接待這些旅客的中國城鎮居民產生了衝擊。中國領導人和普通人民不可能不知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已經成爲新興工業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這三個國家，比中國沿海城市，如上海或天津，還要落後。中國領導人和人民都知道，自由市場和自由經濟體系，是使這些新興工業國取得成功的因素。共產主義的中央策劃，在最初十年，在動員國家資源方面可能很有效。但是現在，這個缺乏伸縮性的制度却使他們停滯不前，這是在中國國內所公認的。每年，數以萬計的中國領導人，從北京和各省份到先進國家以及香港和新加坡旅行。1990年，將近50萬中國大陸的人民訪問了香港、澳門(447,000人)和台灣(5,700人)。他們會見了海外的華人同胞。這些交流對於他們的思想改變是一種强有力的催化劑。

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已經成爲過時的思想意識。身爲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曾公開宣稱：馬克思主義是“過時的思想理論”。他向蘇聯共產黨建議，正式放棄馬克思主義。

自197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一直在

重新考慮他們的基本立場。他們覺察到，像中國那樣的大國，從最早的歷史朝代開始，要國家統一，思想力量往往比武力更加重要。他們還沒像戈爾巴喬夫那樣放棄馬克思主義。然而，早在1978/79年，鄧小平在門戶開放政策的聲明中曾說：“不論是黑貓或白貓，會捉老鼠的就是好貓。”這說明了中國領導人，已經意識到實際效果比理論更加重要。

中國的問題是，如何一方面採取自由市場經濟，一方面保留共產黨控制政府和社會。只要參加過長征的元老還健在，他們作爲統治者的合法地位沒有人可以質疑。他們從戰鬥中解放了中國。但是當他們都不在時，情況可就大不相同，他們的繼承人必須證明他們的統治權的合法地位。要取得合法的地位，他們只能通過快速的經濟和社會進展來趕上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香港和台灣、否則，他們便會面對可怕的問題。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那些在台灣、香港、新加坡、亞細安、美國和歐洲的華人都取得了成功。他們成爲商界、專業界、學術界、甚至政府的領袖。中國領導人和人民了解到，在馬克思主義下建立的中央策劃體制，是一個有毛病的體制。因此，他們試圖加以改革，並引進市場力量來指導生產。不幸的是，他們在如何進行工作方面還不能達致共識。

那些制作了“河殤”電視片集的中國知識份子，在分析問題時做得過火，認爲中國要發展，就要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觀念。在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統治下超40年所遭遇的挫折和失敗，已經歪曲了他們看問題的客觀性。在東南亞的海外華人，主要是來自廣東和福建兩省貧苦農工大衆的後裔，而不是文人學士，或達官貴人的後裔。並沒有聽說狀元。進士或秀才

移民到南洋。然而，這些農工的後裔却成功了，成爲專業人士、學者、企業家、經理和工程師。儒家價值觀使他們家庭團結，盡力撫養下一代，使他們接受良好的教育，富有衝天的幹勁，並且在壓力下工作表現出色。

在美國，華人雖然只占少數，微不足道，但他們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有諾貝爾獎獲獎人、大學校長、作家、企業家和世界第一流的建築師。他們大多數是出身貧寒的移民子弟。因此，試想想中國境內成千上萬具有同樣才華的中國人，他們的天才却被埋沒，白白浪費了。

海外華人社會的成功，令中國感到鼓舞，並且行動起來。中國領導人對它們加以研究，特別是促使台灣、香港和新加坡迅速工業化的各種制度模式。他們要提取其中的原則而加以修改，以適合他們國內的情況。中國的改革過程會比蘇聯的來得容易。台灣、香港或新加坡都沒有蘇聯人社會，可以給蘇聯借鏡。中國人民都知道，這是行得通的，因爲這已經由華人在三種不同的環境下證明可行。其實，自由市場制度已經通過香港擴展到廣東，同時，也通過台灣擴展到福建。

中國領導人所面對的困難是，如何使到幅員廣大的國家在不會引起混亂和動蕩的情況下，順利地擺脫目前的制度。蘇聯的情形，證明了這不是件容易的事。本年7月，西方七大工業國會議舉行之前所擬定的雅夫林斯基—哈佛計劃，曾要求在五年里撥出1,500億美元的援助，以減輕變革所帶來的痛苦以及避蘇聯國內發生動亂。此外，波蘭、捷克和匈牙利等國家的經驗也顯示，在轉換到市場經濟制度時一定

會遭遇困難，這是難免的。

中國最寶貴的資產之一，是它那大批領取政府公費在海外深造的學生(70,000)(另加140,000自費生)。這些學生學成歸國後，不但學有專長，同時對當地國家的社會和經濟制度的運作，有很深的認識。這批幹練人才，對中國實行現代化是非常寶貴的。但是，中國一日不開放門戶，就會有更多的留學生不願回國，而寧願留在西方的華人社會里。矛盾的是，我相信有越多的學生出國深造，對中國越有利，因爲當中國的政治環境再度出現有利於基本改革時，這些學有專長的留學生將會把更多的專門知識帶回國去。

以台灣的情形來說，把電腦工業等高科技帶回台灣的，是一批來自台灣“學成後留下來的博士人才”。並不是所有這些學者都回返台灣。但是那些回去的確實產生重大的影響，使形勢改觀。

我相信，爲了實現中國現代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準備嘗試各種各樣的方法，除了多黨制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之外。他們的兩大理由是：

- 第一，他們深信，中國共產黨必須壟斷政權以確保國家穩定；以及
- 第二，他們深恐多黨制自由公開競爭所產生的不穩定，導至中央對各省失去控制，造成有如20及30年代的軍閥時代的可怕後果。

如果中國要在沒有急劇的動亂和前景明朗的情況下改變，它的過程必須是一種逐步演進

的過程，一種確保制度不受突然顛覆或破壞的逐步放鬆。這實際上就是1977年至1989年間的情況。除了通貨膨脹和貪污之外，情況一般上都逐步改善：更高的增長率和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大的個人選擇職業自由、通過更自由的傳播媒介更容易取得新聞和消息。因此，六四天安門事件是一個大悲劇。學生們自我陶醉，想要在幾個星期內完成波蘭團結總會花了十年才能完成的事業。團結總會逐漸展開行動，以避免直接衝突。他們分階段把制度放鬆，直到最後共產黨政府同意舉行自由選舉。團結總會選舉勝利後，提議並且確實和共產黨分享政權。如果中國的演進延長10至20年，並且沒有因學生拒絕離開天安門廣場而在1989年6月發展至危急關頭，那也可能成爲中國的演進過程。

這種挫折並不是無法扭轉的。我相信中國領導人除了恢復開放和放鬆過程，沒有其他的選擇。他們不可能在沒有外界注入動力的情況下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他們和外界的聯繫越廣，思想和態度的改變就越大。一個固步自封的制度是不可能帶來快速的貿易、投資和旅遊業增長的。

實際上，只要我們保持自我，在生活中取得進步，海外的華人就會成爲中國向前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我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說明了受中華文化思想薰陶的華人，所以能够取得更巨大的成就，就是因爲我們在一個不同的制度下工作。

在這方面，新加坡處在一個特殊的地位。中國的新聞媒介從來不拿台灣或香港作爲中國的模範。這兩個地方同中國太過接近，會令中國感到不自在，在政治上也太過敏感。另一方

面，新加坡却經常被中國拿來作爲翠綠城市、旅遊業、航空公司、機場、海港、公共住屋、工業化等的模範。中國的代表團紛紛到新加坡來考察我國各方面的政策和各種機構組織。

新加坡模式一個吸引人的地方，是執政黨能够連續執政32年，同時改造社會。如果中國的領導人確信他們能够每隔4、5年舉行選舉而繼續再執政多32年，中國就會實行自由選舉。

不過，問題是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從來不敢肯定能贏得下一屆大選。由於我們在下一屆大選中失敗的可能性的確存在，我們都很小心謹慎，不濫用權力，而且，我們滿足了人民的生活願望，證明了我們有治理國家的權力。但是，由於共產黨不必通過選舉而執政，就沒有面對改革的迫切壓力。盡管如此，隨着貿易、投資和旅遊業的增長以及學者的交流、中國的制度將會逐漸開放和放鬆。這方面所需的時間，也許會比戈爾巴喬夫用在改革蘇聯的6年時間還要長。中國不會步戈爾巴喬夫の後塵。我相信中國要成功，並不須要跟隨戈爾巴喬夫所走的路。西方的新聞媒介越大聲地勸告中國走向民主改革，中國領導人就會越加抗拒。他們看到了戈爾巴喬夫如何受誘騙而陷入目前的困境。西方新聞媒介對他的贊揚和歡呼，使他講話的語調越來越像一個西方的自由主義領袖。中國以外的華人可以幫助中國避免鬧紛亂。他們可以使西方人士，特別是西方領袖認識到，基於實際的現實，設法通過更多的經濟聯繫和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交往來改變中國本身的想法和看法，從而帶來一種自然演變的結果，才是明智之舉。

我現在宣佈這個大會正式開幕。